

日本不再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廖省:林越

德国《世界报》于11月8日以“德国突然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为题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最新预测报告称,德国今年将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据IMF资料,2023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预计较去年下降0.2%至4.23万亿美元;德国的GDP预计增长8.4%至4.43万亿美元。让不少国际观察家大感意外。

《日本经济新闻》刊文为政府辩解称,德国能超越日本的原因有三。首先是中期GDP增速,近年在劳动力改革和欧元疲软的情况下,德国的经济增长高于日本。其次是通货膨胀。德国的通胀率高于日本,而名义GDP包含了通胀因素。三是日元近来呈现持续贬值趋势,导致以美元计算的GDP萎缩,而以日元

计算的GDP仍然“增长”。

虽然日本政府尽力粉饰GDP下滑的原因,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回顾往年,日本制造业巨头纷纷把曾引以为傲的业务出售以断臂求生。2015年,松下(Panasonic)将旗下三洋(Sanyo)电视业务出售给长虹集团,长虹承接“三洋”品牌电视的开发、生产、销售和服务。夏普(Sharp)将其美洲电视业务(除巴西外)出售给海信集团,包括夏普墨西哥电视机工厂。又在2016年接受鸿海精密注资,成为鸿海的子公司。

创维收购了东芝(Toshiba)南海冰洗工厂和深圳吸尘器工厂部分股权,获得东芝品牌的冰箱、洗衣机、吸尘器等白电产品在国内销售独家授权。2016年,“美的”以33亿元人民币收购东芝家电业务的主体80.1%的股权。获得40年东芝品牌全球授权,以及超5千项专利。2017年,联想以

250亿日元收购日本老牌企业富士通51%的股份。

随着手机摄影性能不断提升,日本引以为豪的数码相机也奏起了“熄灯号”。过去,佳能(Canon)、索尼、尼康(Nikon)、富士(Fuji)和松下五家日本巨头,供应全球超过93%的数码相机。但十年来,日本相机从2010年的1.2亿台跌至2019年的1500万台。2017年,尼康率先退出中国;2022年,佳能也把相机生产业务移出了中国大陆。

今年7月,日本著名汽车制造商三菱(Mitsubishi)宣布退出中国市场。作为日本最大的财团企业,三菱集团总资产规模曾达21万亿,相当于韩国三星。但进入新世纪后,于2000年及2004年两次刻意掩盖汽车设计漏洞丑闻让三菱汽车跌到了谷底。何况,在面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崛起的冲击下,日本重要支柱的汽车

产业受到严峻挑战。

《环球网》8月10日称,有近150年历史的东芝或在2023年退市,其长达74年的上市历史或落下帷幕。创立于1875年的东芝是日本制造业代表之一,在家电、电气、能源、基建等领域都有巨大影响力。日本的首个灯泡、洗衣机、冰箱、雷达、电视机、微波炉、电饭煲、可视电话,甚至全球第一台T1100号笔记本电脑,全部来自东芝。

就在东芝风光无限时,1987年发生颠覆性的“东芝事件”。事件曝光后,东芝损失惨重,不仅赔钱、被打压,公司高管也被迫先后辞职。21世纪初,东芝“天价”收购美国西屋电气核电业务,但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泄露,核电事业竟成了东芝的累赘。

电子崩盘,核电溃败,东芝在重压之下苟延残喘。为了伪造出“前程似锦”的态势,

东芝开始了长达8年的财务造假,可统计虚报利润差额达1562亿日元之巨。

有人说,东芝的衰落并不是偶然,它是日本制造业集体沉沦的一个缩影。不可否认,日本制造业的衰落受制于不少外因,包括日元的加速升值、世界经济走势的下行,以及市场风向的变化。然而,外因永远不是决定因素,日本制造,到底做错了什么?

曾在日立(Hitachi)工作16年、现任京都大学教师的汤之上隆,总结日本制造业四大教训,矛头指向“创新陷阱”和“匠人精神”。因对技术的偏执,使日本在迎接新技术浪潮时缺乏敏感性,因循守旧,错失机会。还有对“工匠精神”的痴迷,使日本企业长时间采用“终身雇佣制”,目前日本近10%的制造业劳动力是由老年雇员支撑,造就了日本企业工作岗位的老龄化与思维的固化,忽视了市

场实际需求的水平。

瑞穗研究所市场专家长谷川克之说,正因日本制造业太成功,为保护这种成功,本来应当发展新产业时,却去保护那些旧产业,使制造业成为新兴产业发展的掣肘。

加上日本岸田政府没有振兴经济的魄力和远见,却不顾环境安全与国际舆论而悍然把福岛核污染水倒入太平洋,导致名誉扫地。还屁颠屁颠地跟在美国后面对中国进行高科技产品的禁运,大搞“美日菲军演”“四方联盟”,以为中国不敢实施反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报告,使日本“突然”失去了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宝座;如果日本不思进取、冥顽不化、穷兵黩武,岸田政府难以走出“经济寒冬”困境。加上外交政策背离国际主流,“琉球”谋求独立,不久后日本还可能被印度超越呢?

叶添兴——人权捍卫先驱

廖建裕



叶添兴(YAP THIAM HIEN)

叶添兴(Yap Thiam Hien)是一位在华人圈中有着出色贡献的人物。他是印尼人权捍卫的积极分子,也是印尼捍卫基本人权协会(Lembaga Pembela Hak Asasi Manusia)的创始人。不论是敌人还是朋友都很尊敬他。他勇敢捍卫每一个人的基本人权,无论是左翼人士还是右翼人士;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是富人还是穷人。最后他成为印尼人在法律和基本人权方面的标杆。

1913年5月25日叶添兴出生于班达亚齐(Banda Aceh,旧名Kutaraja,哥打拉夜)。家里三兄弟,他是最大的一个,他的爷爷是一名华人甲必丹。他童年时代在亚齐的经历对他影响很大,他对罗盘报(Harian Kompas)记者说:“我从小就在封建的种植园环境下长大……童年时的经历让我厌恶一切形式主义的专横和压迫。”他小学就读于欧洲小学(Europese Lagere School,简称ELS),一所专为荷兰小孩设置的小学。在这所小学读书的期间让他意识到了种族歧视的问题,因为在学校里,他经常被那些来自荷兰的孩子们捉弄嘲笑。

1926年小学毕业后,他在班达亚齐继续初中教育(Uitgebreid Lager Onderwijs,简称MULO)。1929年初中毕业后,他到日惹(Yogyakarta)的高中(Algemene Middelbare School,简称AMS)学习西方文学并于1933年毕业。高中时,他阅读了大量荷兰、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文学作品。之后,他转到了巴达维亚(Batavia)荷华师范学校Hollands Chinese Kweekschool,简称HCK)里继续学习。1934年毕业后,他在好几所以华人为主的学校里任教。

起初,叶添兴是在井里汶(Cirebon)荷华教会学校(Hollands Chinese Zending School)教书,后来又转到了位于南望(Rembang)中华会馆(Tiong Hoa Hwe Koan)和荷华学校里任教(Hollandsch Chinese

School,简称HCS)。之后,他又到了雅加达(Jakarta)的轮船保险公司(Lloyd)工作。接着他在雅加达新开的法学院报名入学。可惜,在他还未完成学业时,日本侵略者来到爪哇。他不得不中断学业并重新投身于工作上去。这次他任职的地点是在雅加达的司法部遗产管理局(Balai Harta Peninggalan)。

1946年,叶添兴在荷兰莱顿(Leiden)学习法律,并于1947年获得法律硕士学位(Meester in de Rechten)。从1949年直至逝世,他的职业生涯都贡献于法律工作上。除了在法律领域方面,他还积极参与在中爪哇省的中华基督教协会(Tionghoa Kie Tok Hwee (Perkumpulan Kristen Tionghoa)的活动。1950年,他协助建立了印尼教会教育基金会(Yayasan Pendidikan Gereja Indonesia)并一直活跃在基金会中直到1957年。

因为对华人事务的关注,1954年3月13日,叶添兴在雅加达参与创建以土生华人为主的印尼国籍协会(Badan Permusyawaratan Kewarganegaraan Indonesia,简称Baperki)。在国协中,他踊跃发表意见。1955年他当选成为国协中央委员会四人主席团中的成员。此外,他从1956年至1960年间还担任国协第一副主席。

因为叶添兴热衷于批判的性格,使得他常与当时国协总主席萧玉灿(Siauw Giok Tjhan)存在意见分歧而被边缘化。萧玉灿认为种族排他性作为殖民时期所遗留下来的产物在现代社会中应该根除。而叶添兴则认为,问题的根源应来自于多数群体和少数群体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要遵循基督教“净化心灵”(Permurnian hati)的教义,问题方可得到解决。

1960年12月,叶添兴指责萧玉灿引领印尼国协向左倾斜,从中立变成具有共产主义色彩的组织。同时,他也指责《1945年宪法》(Undang-Undang Dasar 1945)里关于印尼总统必须为“印尼土著”这一带有歧视性质的条款。然而,萧玉灿却认为政治现实比一切都重要;印尼国协为了得到苏加诺总统的支持,宣布支持和拥护《1945年宪法》,从而巩固苏加诺的总统地位。此之,叶添兴开始被国协边缘化。

1967年,当叶添兴反对改名换姓时,他再次在公众前掀起轩然大波。他呼吁,“所有热爱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的印尼国民,特别是印尼的基督教徒,理解和尊重其他族群的观点和文化。”因此,叶添兴被认为是坚守中华文化的一员,说他憎恨本地文化、反对与印尼人通婚。其实,在文化

方面,叶添兴已被印尼化了,因为他既不会讲华语,也不懂华文。他的作为,实际上只是为了捍卫基本人权。

在旧秩序时代(Orde Lama),叶添兴发声要求释放像穆罕默德·罗姆(Mohammad Roem)、莫达尔·卢比斯(Mochtar Lubis)、苏巴蒂奥·萨斯特罗萨多莫(Soebadio Sastroatomo)、素丹·夏利尔(Sutan Sjahrir)和H·J·C伯林森(H.J.C Princen)等政治犯。同时当林鞠良(Liem Koe Nio)被怀疑是国民党党员且被告要颠覆经济时,他也挺身捍卫他。新秩序时期(Orde Baru),叶添兴被特别军事法庭 Mahkamah Militer Luar Biasa,简称Mahmilub)任命,为参与1965年政变失败的“九三零”事件的中苏班德里约(Soebandrio)辩护。很多人认为叶添兴竟然会维护他的政治对手而感到惊讶。1967年,叶添兴出任古益有限公司(PT. Quick)的总裁,公司主要经营汽车进口和维修业务,但是在公司经营过程中却遭到了当权者的压榨。在法庭上,他指控警察局长的压榨行为。在这件案件结束后,叶添兴因被指控参与“九三零”事件而被拘捕。这是因为他曾经是支持印尼共产党的国协成员。后来,因为公共舆论的压力,叶添兴被释放。

叶添兴坚定地认为如果当权者权力过大,控制过多的话,社会中脆弱,地位低下的基层人士将难以保护自身的利益。因此,1966年他与好友们共同建立了捍卫基本人权机构(Lembaga Pembelaan Hak Asasi Manusia)。1970年他跟阿南·布勇·纳苏蒂安(Adnan Buyung Nasution)及其他朋友共同建立了法律援助机构(Lembaga Bantuan Hukum,简称LBH),后来发展成为在印尼各地拥有众多分会的机构。在国际方面,叶添兴是创立于马尼拉(Manila)的亚洲区域人权理事会(Regional Council of Human Rights in Asia)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国际法学家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的成员之一。由于他在法律领域的辛勤工作和斗争,他于1980年获得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Vrije Universiteit)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1981年他还获得印尼法律援助和服务中心(Pusat Bantuan dan Pengabdian Hukum Indonesia)颁发的“法律服务界楷模(Pengabdian Hukum Teladan)”的称号。

1989年4月,在参加比利时布鲁塞尔(Brussels)举办的非政府民间组织(LSM)国际会议时,叶添兴不幸逝世。(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三册)》)

中国学者：南海已进入多事之秋，危机管控是各方当务之急



南海之声

今年以来,随着菲律宾不断在海上挑衅滋事,美西方舆论进一步炒作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论”,南海局势呈现比较明显的紧张态势。在11月8日举行的“2023年海洋合作与治理论坛”场外,华阳海洋研究中心理事长、中国南海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吴士存接受中央广播电视台总台南海之声专访时表示,南海形势在未来一段时间恐将继续升温,急需各方增进互信,有效管控南海局势。

南海已经进入多事之秋

吴士存表示,尽管南海形势总体稳定可控,但已经进入多事之秋,其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南海政策已经发生变化。

这首先表现在美国主导的南海军事化正在加速演变。当前美菲军事合作不断升级,通过“变相”获取更多菲律宾军事基地,美国正在强化其在南海区域的前沿军事部署。同时,美国加速推进一系列针对中国的安全合作机制,“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已经出现向南海延伸和扩大的趋势,“美菲+”南海联合巡航也吸引澳、德、英、法等国的申请加入。

“所有这一系列的机制都是美国给中国量身定制的”,吴士存表示,这些频繁的军事部署和军事行动,“有朝一日可能让南海因此成为一个火药桶”。

吴士存同时指出,“美国的南海政策不再中立,谁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对抗,美国就支持谁”。

对于越南非法侵占南海岛礁,美国视若无睹,对于菲律宾在仁爱礁上的言而无信甚至不断挑衅,美国以《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为其撑腰,偏袒和纵容其改变南海现状,以此来增加中国在南海维权维稳的成本。
“仲裁裁决”

正在死灰复燃

2016年,菲律宾向国际法庭提起单边仲裁诉讼,中国对所谓“仲裁裁决”表示不参与、不接受、不承认。吴士存表示,“南海很大一部分问题都是因‘裁决’而引发,没有‘裁决’南海要消停得多”。

当前“仲裁裁决”的负面影响正在扩大,不仅菲律宾动辄拿“仲裁裁决”说事儿,对于南海其他声索国来说,“仲裁裁决”为其在单方面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内进行油气开发,或在其非法控制的岛礁上进行扩建和设施部署,提供了“背书”。

近日,菲律宾扬言将在明年向国际法庭对中国在南海破坏珊瑚礁生态提起诉讼,吴士存表示,这很可能让南海面临“仲裁”死灰复燃的新局面,其他一些南海国家也可能步菲律宾的后尘,效仿其提起新的仲裁,这些都恐将在南海掀起新一轮的法律战。

“在我看来,现在菲律宾所谓提起新一轮仲裁还只是一种试探”,吴士存直言,菲律宾需要真正考虑和评估其提起仲裁的后果,以及其是否还能获得足够的支持,“如果菲律宾铤而走险制造新的危害南海和平的事件和违反《宣言》承诺,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在海上采取维权行动。如果菲律宾迈出这一步,我认为完全可以采取必要措施,趁机把仁爱礁问题一了百了地解决了”。

管控南海局势 急需各方增进互信

“当前在南海问题上,我们最大当前问题是互信的缺失。”在吴士存看来,管控南海局势,关键之处首先在于各方增进互信,防范风险。

吴士存肯定中美举行首轮海洋事务磋商的积极效应,但他并未对此盲目乐观,“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分歧短时间内就能缩小,磋商是良好的第一步,在这个基础上,完善海空相遇行为规则,建立有拘束力的海空行为规则,防止类似2001年南海撞机这种灾难性的事件再次发生,这是中美当前能够做的”。

对于中国和东盟国家来说,建立南海危机管控机制,同样也是当务之急。吴士存指出,南海争端国应该借助外交磋商机制、海上紧急事态的沟通热线等,促进彼此的战略和政策协调,避免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误判。

与此同时,开展渔业资源养护、海洋生态保护、海上联合搜救等一系列海上务实合作来增进互信,这既是切实可行且有利于子孙后代的好事,更是推动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和“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的应尽之责。

“这些事情我觉得都是可以做的,需要时机,也需要有早期收获”,吴士存建议可以从低敏感领域的双边合作开始,“让大家看到好处和利益,慢慢就能产生更多的意愿和互信。”



漫点南洋 (本报原创漫画)
停止杀戮 作者: Lee
投稿邮箱: editor@guojiribao.com